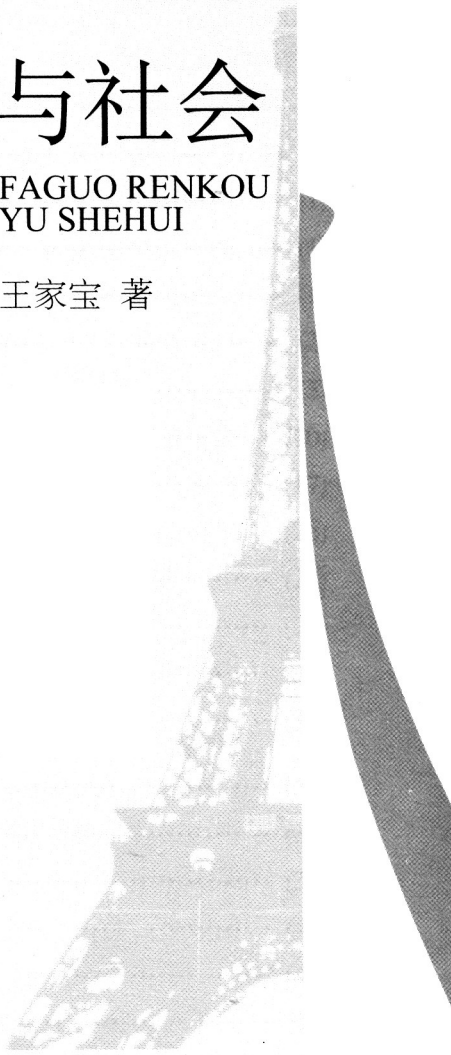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基金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资助

法国人口与社会

FAGUO RENKOU
YU SHEHUI

王家宝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3)
前 言	(1)
第一章 人口数量	(1)
第一节 人口态势	(1)
1. 人口曲线的“U”形走向	(2)
2. 出生率下降(19—20世纪)	(5)
3. 死亡率回落(19—20世纪)	(10)
4. 法英两国人口比较	(17)
第二节 劳动人口	(26)
1. 劳动人口与劳动生产率	(26)
2. 男女劳动生产率的演变	(29)
3. 劳动力的行业转移	(32)
4. 劳动人口的年龄结构	(35)
第二章 人口结构	(38)
第一节 婚姻家庭	(38)
1. 不稳定的婚姻	(39)
2. 核心家庭的出现	(43)
3. 非婚同居	(49)
4. 独身现象	(53)
第二节 老龄社会	(56)
1. 预期寿命的延长	(56)
2. 老年人口的增加	(59)
3. “年轻”的北方与“年老”的南方	(62)

4. 老龄化社会的负面影响	(65)
第三章 人口分布	(70)
第一节 农村外流	(70)
1. 19世纪的农民外流	(72)
2. 农村本身的推力	(76)
3. 20世纪的民工潮	(82)
4. 工业化的引力	(86)
第二节 城市发展	(95)
1. 19世纪的城市化	(96)
2. 20世纪的城市化	(102)
3. 巴黎的人口增加与市政建设	(111)
4. 城市化的经验教训	(126)
第四章 人口政策	(133)
第一节 家庭政策	(133)
1. 人口众庶主义	(134)
2. (新)马尔萨斯主义	(138)
3. 迟到的家庭政策	(147)
4. 家庭政策的阶段性效果	(156)
第二节 外国移民	(161)
1.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161)
2. 三次移民潮及数量	(165)
3. 移民群体的走向与就业	(168)
4. 法国人的排外情结	(173)
附 录	(185)
参考书目	(190)

序 一

王家宝先生的《法国人口与社会》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专题著作。作者通过大量的具体资料，运用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对法国19世纪以来的人口与社会问题，包括人口的数量、结构、分布，人口理论和政府的人口政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全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内容翔实、资料丰富，而且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学术观点，例如：

1. 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人口理论进行了批驳，指出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境地和揭竿而起的真正原因“不是所谓的子女过多，而是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这与马克思指出的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的观点是一致的。

2. 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认为对于人口增长速度等于或者超过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对这一理论不能加以否定；而对于像法国那样人口稀少、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说则不必过于强调。与此同时，作者又认为：“尽管如此，亦不能断言人口数量的优势决定历史的进程。”这一观点是符合辩证法的，而且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

3. 通过对历史上法国与英国人口发展状况异同的比较研究，指出19世纪法国人口增加比英国相对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国工业化的滞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业化集中过程缓慢、无需大量

使用童工和大规模接受移民等因素。这一观点表明,一个国家人口的发展是受经济因素制约的。

以上一些观点都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通过展示具体材料和对这些材料进行客观分析的结果,因而使这些观点的论据显得充分有力,而且明显地反映出本书史论结合的特点。

本书不仅具有理论和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研究法国的人口与社会问题,对于考察我国的有关问题,如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现代化进程出现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男女人口比例失调的问题,以及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增大的问题等等,无疑具有历史的借鉴作用,读者也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本书的资料相当丰富。书中不仅使用了不少有关的中文资料,而且引用了大量的法文资料,其中不少是近年新作。这一方面增加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也扩大了读者的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之骅

2004年7月11日(第15个“世界人口日”)

序 二

王家宝同志曾发表《法国人口思想流派》、《法国移民问题浅析》、《论法国的家庭政策》等论文,本书是他多年从事法国人口问题研究的结晶。

《法国人口与社会》一书主要论述自19世纪以来,法国人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法国的人口一直表现出缓慢的增长趋势,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不相适应。有鉴于此,法国政府一方面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从经济上鼓励多生多育;另一方面,采取引进外国劳工的移民政策,从而缓解了人口危机,解决了劳力不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作者认为,外国人的到来虽然促进了法国人口和经济的增长,营造了法国的多元文化,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犯罪率上升、种族矛盾加深、社会动荡等等。

至于法国人口长期缓增的原因,作者并未拘泥于“经济制约人口发展”的现成公式,而是从时代的趋势和历史的渊源上去寻找答案,得出结论:历史上法国子嗣平分遗产的继承制度、民众根深蒂固的节育观念,以及个人追求享乐的生活习惯才是人口缓增的主要根源。

本书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性地介绍了西方的一些人口理论:“人口众庶主义”、“马尔萨斯主义”等(第四章);本书还

尽可能就欧洲国家之间的人口状况,法、德两国家庭政策,中国与西方国家老龄化社会的负面影响等问题进行比较研究。

《法国人口与社会》虽然着墨于法国,但以史为鉴,对人口大国如中国、印度等不无借鉴意义。比如,法国农民外流、城市化遭遇的问题、人口增长与经济关系的辩证关系等等,无不像是一面镜子,任凭对比、反思。然而,本书不足之处亦就恰恰在这里,主要是没有对中、法两国的人口态势进行全方位的比较,颇有欲言又止之感,这也许是苛求了些。另外,从写作手法上说,专著的末尾只是写到外国移民便戛然而止,未能前后呼应,对全书作总结性的概述,意犹未尽,遗憾了点。虽然如此,瑕不掩瑜,诚如陈之骅先生所言,本书不仅具有理论和学术价值,而且还有现实意义,对于考察我国的人口问题,如劳动力转移、城乡差距拉大、男女比例失调、老龄化等无疑具有历史借鉴的作用。

《世界历史》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编审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理事

张 丽

2004年9月15日

前 言

恩格斯说过：“生产本身分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19世纪初工业化兴起后，法国的物质文明越来越高，人民的生活条件日趋改善。与此同时，人口出生率渐次回落，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下降；横向比较，从19世纪初起的40年间，人口仅增加数百万，增长率低于10‰，而同期俄、德、英、奥匈帝国所增加的人口各以千万计，增长率均远远高于法国。邻国所具有的人口资源优势显而易见，法国有识之士为此而惶惶不可终日，积极寻找良策以应对每况愈下的人口态势，而历届政府却囿于所谓“保护个人隐私”的立场，对此无动于衷。

很早以前，法国的重商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及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就主张增加人口。至1896年，人口学家雅克·贝蒂龙更是创建了“法兰西全国人口增殖联盟”，敦促政府制定家庭政策，鼓励生育。但是，当局以“不干涉民众的生活”为由，长期不予置理。直到1939年德国人口高速增长、国内人口众庶主义者的呼声不断高涨，政府为形势所裹胁，不得不推出《家庭法典》，此后辅之以种种法规，发放补贴、奖励多胎，但为时已晚，响应者寡，成效有限。

究其原因，主要是民众古而有之的节育观念根深蒂固，加上《拿破仑法典》规定子嗣平分遗产，(新)马尔萨斯主义鼓吹道德抑

制、避孕节育,法国人越来越“不愿让瞬间的快乐破坏美好的生活,抑制交媾似乎变成了一个民族的习惯”。年轻人只想“性”福,而不愿尽为人父母的责任。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嬗变,“sexualité”代替了“fraternité”(“性爱”代替“博爱”),大革命弘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仿佛变成了“自由、平等、性爱!”结果是喜结连理减少、非婚同居普遍、单身队伍扩大、家庭细胞变小、老年人口增加,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生育率下降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城市劳动力的匮乏。因此,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成为必然。但要指出的是,人口内部迁徙的原因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19世纪上半叶农家子弟进城主要是因为农村人口相对过剩、农业生产发生危机、公田数量逐渐减少等,与工业化关系不大。他们在城里主要从事石匠、仆从、奶妈等职业就是明证。20世纪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经济需要复兴,农民于是大量涌入城市,多在工矿企业就职,这说明基本上是为城市所吸引。因此,农村的“推力”,城市的“引力”各自在不同的时期发挥主导作用。

法国人口缓增,农民变工人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城市化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引进外国劳工殊有必要。从外国移民占法国总人口的比例来说,法国是第一大移民接受国。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外国移民虽然为法兰西的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却为法国的种族主义分子所不容。特别是姗姗来迟的北非移民因语言、文化的差异太大而一时难以融入法国社会,更是成了历次经济危机的替罪羊。

人、社会、自然界融为一体,互相依存、相互促进,人类藉此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社会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其中,经济的发展对人口的再生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法国人口态势日趋严重,表面原因是

人的伦理道德、生育观念发生了变化,实则是经济杠杆在起作用。“不仅仅出生与死亡的数量,而且是家庭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成反比。”(马克思语)19世纪起特别是到了现代,法国工人的薪金收入稳步提高,出生率却逐渐回落就是明显的例子。国内人口流动不论出于“推力”还是“引力”都离不开农村经济滞后、城市经济复兴这一主导因素。现代化建设还改变了人口的阶级、职业、知识等结构,否则,法国可能还是一个农民、文盲、第一产业独占鳌头的国家。即使是外来移民,无论是数量的增减还是分布的远近亦无不随着法国经济建设的需求而发生变化。当然,按照斯大林的说法,人口对经济有反作用,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但是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

战争亦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不可忽视。综观法国历史,内乱不已,外患迭起,前后两次世界大战对法国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尤为严重。战争期间,丧生者数以几十万乃至数百万计,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数,总人口数量锐减;尤需指出的是,死亡者多为壮年男子,因而造成性别比例失调、人口年龄结构畸形;即使是幸存者,面对残酷的战争、艰难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少生育甚至不生育,人口出生率因此大大低于平时正常年份;而侥幸出生的婴儿不少因生存条件的恶劣而夭折,因此,低出生率、高死亡率致使新增的人口少于往年。战争结束后,结婚、生育高潮迭起,人口骤增,但要成为劳动人口,在国家经济复兴中派上用场则起码需要一代人的时间。“远水救不了近火”,国家不得已引进外国劳工,以解燃眉之急。战时低出生率、战后高出生率,20年后相继造成劳动力的忽多忽少,打乱了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均衡供需关系,埋下了社会动乱的隐患。

自然灾害如瘟疫对人口再生产亦曾有过消极的影响。中世纪法国人口曲线出现了马蹄形走向,总人口骤减,原因是1348年遭到

了黑死病的袭击,时疫流行初期人口竟减少了1/3。1720年,马赛爆发了一场鼠疫,8万人口只剩下一半。幸喜这种传染病此后再也没有传播过,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的进步,疫苗接种的普及,法国人预防、治疗疾病的能力越来越强,在大自然面前不再无能为力,而是成了驾驭它的主人,否则,法国近现代的人口态势要更为严重了。

人口研究离不开数字、图表,但这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书的宗旨是通过必要的数据,揭示出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依存关系以及法国人口缓增的前因后果;说明(新)马尔萨斯主义对人口爆满的第三世界来说不无合理之处,但对法国这样人口稀少的国家而言毫无必要。

《法国人口与社会》虽然着墨于法国,但以史为鉴,对人口大国如中国、印度等不无借鉴意义。如其中的法国农民外流、城市化遭遇的问题、人口增长与经济关系的辩证关系等等,无不像是一面镜子,任凭对比、反思。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解放初由于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说是“人多好办事”,结果是生育毫无节制,人口骤增。有鉴于此,有识之士痛感在生产尚不发达之时,节制生育殊有必要。一段时间以来,持之以恒,成绩显著。据报导,“2003年我国圆满完成了人口计划。全国妇女整体生育率平均保持在1.8左右(平均每位妇女终生生育1.8个子女),人口出生率在13.37‰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在7.25‰,全年净增人口不超过1,000万,年末总人口可控制在12.94亿以内。”(蓝燕:《我国总人口仍在13亿以内》,《中国青年报》,2003年12月26日)由此可见,马尔萨斯的所谓“道德抑制”对计划生育的启示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节 人口态势

公元初迄今,法国人口曲线大致向上攀升:公元1年至1000年为500—650万人,10个世纪里增加了150万;1000年至1500年为650—1500万,5个世纪里增添了850万人;1500年至1990年为1,500—5,600万人,5个世纪不到的时间里又增加了4100万人。自古至今,法国的人口增长好像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由此可以说明: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人类的自身繁殖逐渐摆脱了诸如饥荒、瘟疫等的影响,向着良性的轨道行进。人口增长曲线虽有三次马蹄形的负增长,但所幸的是每次持续的时间都不算长,相对来说无妨大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总体而言,人类社会的进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然而,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纵向比较,法兰西自我感觉良

好,可以沾沾自喜。但是,横向比较,特别是与一衣带水或是近在咫尺的英国、德国相比,无论是人口增长率还是人口密度,抑或是人口总量,法国都要相形见绌,远远落在后面。如18世纪初法国人口总量为2,000多万人,占欧洲总人口的1/5(俄罗斯除外),独占鳌头;到了1914年人口总数不到4,200万人(阿尔萨斯、洛林被德国占领,故除外)。虽然就自身来说,人口总量翻了番,可以引为自豪,但在欧洲总人口中的排名却大大靠后,退居第五名。原来是每5个欧洲人中就有1名法国人,截至那时止,则变为每10个欧洲人中才有1名法国人。究其原因,不是妇女的生育力有问题,而是因为200余年来出生率下降得比人家快,换言之,法国人不想生孩子,女人的生育率或繁殖率不如人,这恰恰与法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18世纪初法国人口为2,250万,为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加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影响而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就人口数量而言,仅在遥远的中国、印度和日本之下;然而,到2004年初法国人口近6,000万,位于欧洲第4、世界第21位。法兰西为世界第五经济大国,而人口大国的位置却一落千丈,原因何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相对的人口弱势由来已久,起始于启蒙时代。”(努瓦等:《法国人口》,巴黎,2004年第七版,第3页)

1. 人口曲线的“U”形走向

公元初始,据专家估计,法国的人口总量为500万,罗马统治的200年间,达650万;公元400年,虽然历经几百年,人口总量仍为500万,原因是日耳曼人越过莱茵河向西挺进,几乎每年都要对高卢进行掠夺性的袭击,致使当地居民或死于非命,或流离失所,人口自然骤减。至公元600年,人口数量跌到谷底,为450万,主要原因还是东边的日耳曼民族的不断入侵,其中尤以法兰克人的西进最为令人瞩目。入侵的蛮族虽然成了新的统治者,但他们只知道建立、发

展自己的封建制政权,对振兴高卢—罗马的经济却显得力不从心,一筹莫展,导致辖区内的人口锐减。话虽这么说,但是,社会的进步毕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经济或快或慢的发展,在前4个世纪中丧失的人口,在此后的4个世纪里渐渐得到了补偿,从公元600年至公元1000年,人口又恢复到罗马统治期间的650万这样的水平。

之后法国的人口有了不可忽视的增长,中国史学家认为:“约从9世纪起,生产力才有明显的发展,首先,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奴隶集约劳动逐渐消失,昔日的奴隶成为农奴,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人口也有所增加,从11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中叶,法国人口大约增长至3倍。”(沈炼之主编、楼均信副主编:《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1页)英国史学家对此亦持相同的看法,认为从公元1000年起法国人口迅速增长:“尽管有一些冒险者到英格兰、意大利等地去了,但在11世纪下半期还是增加了100万人口。在12世纪增加的人口为250多万……到13世纪则增加500多万。到14世纪达到1,600万或1,700万。”(麦克伊韦迪等:《世界人口历史图集》,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51页)可是,好景不长,法国人口旋即因长时间遭到黑死病的袭击而直线下降,到14—15世纪相交时锐减至1,100万,少了500万左右。雪上加霜的是,除瘟疫外,该时期法国人口的减少还与法英百年战争、扎克雷农民起义有关,虽然未有人员损失具体数字,但必须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继之,人口又向上攀升,到15—16世纪相交时达1,500万,但仍未达到14世纪时的水平,只是到了1550年人口数量才勉强回复到这个水准。

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100年间人口上升到2,100万,增加1/3。继之蹒跚行进,究其原因是天灾人祸,前者系指瘟疫和饥荒,后者则指路易十四驱逐胡格诺教徒、连绵不断的征伐战争。太阳王驾崩后的200年间虽有马赛的鼠疫、1789年的大革命、拿破仑战争、

法德冲突等等,但曲线基本上向上蹿升。然而到了20世纪上半叶,由于发生了前后两次世界大战,而法国又恰恰身受其害,人口由4,100万下降到4,000万。战后法国推行《家庭政策》,引进外国移民,人口一度上升,但是,由于节制生育观念根深蒂固,法国人对生儿育女的热情未能持之以恒,从70年代起,人口自然增长率渐次回落,1990年人口总数为5,660万人。(努瓦等:《法国人口》,巴黎,2004年,第七版,第4页)

如上所述,2000余年来法国人口增长曲线上有三次“U”形走向。第一次是从公元200年到1000年间的马蹄形,虽然下跌幅度不大,损失200万,但经历的时间长,过了800年才回复到原来的650万的水平。第二次发生在1300年到1500年,人口量变惊人,再次在曲线上呈现“U”形,跌幅令人咋舌,为500万。不幸中的大幸是,历时不长,仅仅经过了150年就恢复到了原先1,600万的水平。第三次人口总量下降出现在1918年至1945年,损员100余万,后来由于家庭政策的出台、外国劳工的到来,曲线重又回升,从而形成了马蹄形,历时仅数十年而已。概言之,古代、中世纪、近现代,法国人口增长曲线上各有一次“U”形嬗变,下跌幅度逐渐缩小、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充分说明,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与日俱增,在瘟疫、饥荒、战争面前不再是听天由命,而是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人类自身的繁殖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从而保证了种族的繁衍。

除去三次马蹄形外,法国人口总体上来说还是呈增长趋势,只不过是在各个阶段人口增长的数量各不相同。试以500年为一段来进行剖析:公元1至500年,人口总量为500—450万;从曲线上看,人口总数略有减少;公元500—1000年,人口总数为450—650万,总量稍有增加;公元1000年至1500年,人口总量为650—1,500万,人口增加二倍不到;公元1500年至2000年,据推算

人口总数为1,500—6,000万,增加三倍。从这些大的时段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人口增加相当可观,除第一、二个500年后,以后每隔500年人口总量的增加分别为二至三倍。要不是从19世纪初起出生率逐渐下降的话,法国的人口还可以增加得更多,不至于落在邻国的后面。

2. 出生率下降(19—20世纪)

当今,发展中国家人口膨胀的速度令人瞩目,而发达国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长期以来人口增长的速度相当缓慢,令当局伤透脑筋。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出生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出生率系指:在一定的时期内出生人数与同期总人口之比,以千分数表示,反映人口出生水平,在死亡率不变的情况下直接影响人口总量。

(1) 出生率一泻千里

有人认为,结婚率与出生率成正比,表面上看,这种观点可能言之有理。但是,对法国来说,在特定的时段里却是例外。20世纪40年代以前,法国的结婚率除个别年份有高有低外,基本上稳定在15%左右,而同期的出生率除特殊情况外却一落千丈,由32%跌落到16%。这充分说明,出生率并不因结婚率的高低而潮起潮落。

1781—1784年、1811—1815年,结婚对数分别为23、25万,而同期出生人数各自为96.5、93.1万,喜结良缘的男女青年增多了,而爱情的结晶却反而减少了,从而表明:结婚率与出生率不一定“水涨船高”。人们不禁要问,那么,拿破仑时代结婚率高、出生率低的原因何在?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拿破仑酷爱战争,连年的东征西伐,令人没有心思生儿育女;第二,法国史学家马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在对埃鲁、上朗格多克等地进行研究后认为:“在一代人稍多的时间里,许多伉俪的行为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开始大量采取避孕措施……”第三,“《拿破仑法典》规定子嗣平分遗产是法